

世界文化
名人文库

SHIJIEWENHUAMINGRENWENKU

下

托尔斯泰散文

刘 宁 编

中国广播电视台出版社

世界文化名人文库

托尔斯泰散文

刘 宁 主编

(下)

中国广播电视台出版社



托尔斯泰 70 年代创作《安娜·卡列尼娜》



托尔斯泰与夫人



托尔斯泰在书房



老年托尔斯泰

目 录

忏悔录

忏悔录	3
一个基督徒的笔记	70
我属于那样一种人	75

随笔

城市生活	103
乡村生活	115
乡村三日	123
莫斯科的贫穷使我大吃一惊	147
勒然诺夫城堡调查记	164
我又看到一场公开进行的欺骗	194
这回我亲眼看见了……	200
对话	206
观看《尼伯龙根的指环》	213
当代奴隶制度 ——铁路货	220

书信

与文人书	233
与家人书	280
与恋人书	291
与妻子书	303
与君臣书	318
与公众书	334
离家出走之书	33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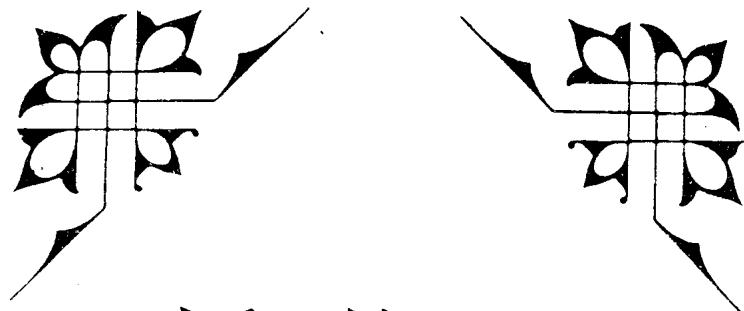
日记

1847—1910	353
-----------	-----

遗嘱

五份遗嘱	517
对遗嘱的说明	524

托尔斯泰创作年谱	526
----------	-----



忏悔录





忏悔录

(未出版文集的序言)

一

我接受了东正教的洗礼和教育。从童年开始,连同整个青少年时期,人们一直以这种教义对我进行教育。可是当我十八岁,念完大学二年级的时候,我对教给我的一切都不相信了。

现在回忆起来,我从来也没有真正相信过,只不过对教给我的一切和成人在我面前的说教有一种信任的态度而已,但这种信任是很不牢固的。

我记得,我十一岁的时候,有一个孩子(他早已去世),叫沃洛坚卡·M,是个中学生,星期日到我们家来,把学校里的新发现作为一件特大新闻向我们宣传。这新发现就是:上帝是没有的,教给我们的全是无稽之谈(这发生在1838年)。我记得,几个哥哥对这件新闻很感兴趣,他们也叫我一起议论。我记得,我们大家非常兴奋,把它当作一件十分有趣和完全可能的事。

我还记得,我哥哥德米特里在念大学的时候,突然以其性格中特有的激情,一心一意信起教来,并开始参加一切礼拜,吃斋,



过着清白而高尚的生活。于是我们大家,甚至年长的人,都不断地嘲笑他,而且不知为什么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诺亚。我记得,那时的喀山大学督学穆辛——普希金经常邀请我们到他家参加舞会,他曾多次用大卫在方舟前面也跳过舞来戏说拒绝参加舞会的哥哥。当时我对年长的人开的这种玩笑是支持的,还由此得出结论:教义要背,教堂也应该去,但把这一切看得太认真则大可不必。我还记得,我非常年轻的时候就读过伏尔泰的作品,他的冷嘲热讽不仅没有使我愤怒,反而使我非常高兴。

我脱离了宗教,受过我们这类教育的人过去和现在都发生过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多数情况是这样的:他们和大家一样生活着,而大家的生活原则不仅与教义毫无共同之处,相反,多半与之对立。教义不参与生活,人们在相互交往的过程中永远不会与它发生关系,在私人生活中也从来不按教义行事。这种教义在某个远离生活、独立于生活之外的地方被信奉着,如果与它有一点关系的话,那也不过是把它当作一种表面的、与生活没有联系的现象。

根据一个人的生活,他的事业,无论是现在还是以前,都不能断定他是否信教。如果说,公开信奉正教与不信教的人还有所不同的话,那也并不对前者有利。无论是现在还是以前,公开推崇和信奉正教的大都是一些愚蠢而残酷,既无道德又自以为了不起的人。自称不信教的倒大多是一些聪明、诚实、坦率、善良、高尚的人。

小学讲授教义问答,并且让学生上教堂。官吏得交出圣餐的证明。但现在(过去则更多),我们这类人,由于不再学习,又不出任公职,可以生活几十年而从来也不想到自己生活在基督徒中间,还自称是正教信徒。

因此，无论现在或过去，由于信赖而被接受并由外部压力支持着的教义，在与其对立的知识和生活经验的影响下逐渐消失，可是一个人往往活得很久，自以为还完整地保持着童年时代接受的教义，实际上它早就踪影全无了。

C 聪明而又真诚，他告诉我他怎么会不信教的。他大约已经二十六岁，有一次狩猎宿夜，按照自小养成的习惯开始做晚祷。和他一起去打猎的哥哥躺在草堆上看着他。当 C 做完了晚祷，准备睡觉的时候，他的哥哥对他说：“你还一直这样做吗？”后来他们俩也没有再谈下去。从此以后，C 就不再做祷告和上教堂了。他就这样三十年不做祷告，不领圣餐，而且也不上教堂。并非因为他知道了哥哥的信念，同意他的观点，也不是因为他心里已经作出某种决定，只是因为哥哥讲的这句话好像一个指头向一堵由于本身的重压快要倒塌的墙上戳了一下，它指明了他原来以为被信仰占据的地方已经一无所有，因而他做祷告时的祷词、画十字、行礼膜拜等等完全是毫无意义的举动。他一旦了解这一点之后，便不会再这样做了。

我想，过去和现在的大多数人都如此。我指的是具有我们这种教养的人，指表里如一的人，而不是指把信仰的对象当作猎取眼前利益的手段的那些人（那些人最不相信宗教，因为既然宗教对他们来说是满足某种生活需要的手段，那么这就已经不是宗教了）。具有我们这种教养的这些人的处境，就像一幢虚假的大楼在知识和生活的阳光照耀下溶化了一样，他们有的已经发觉这一点，并把它清除掉了，有的还没有看到这一点。

和其他人一样，童年时代教给我们的教义在我头脑中消失了，只有一点差别：由于我很早就开始大量阅读和思考问题，我对教义的否定早就是自觉的。我从十六岁开始不作祷告，自己主

动不上教堂，不作斋戒祈祷。我不再相信小时候教给我的一切，但我总还有某种信仰。究竟我信仰什么，那我是怎么也讲不清楚的。我也相信上帝，或者更确切些说，我不否定上帝，究竟是怎样的一位上帝，我也讲不清楚。我也不否定基督和他的学说，而这些学说的实质是什么，我同样讲不清楚。

现在，回忆那段时间，我看得很清楚，我的信仰，即除了动物本能之外推动我生活的力量，也即那时我的唯一的信仰，是信仰完善。但是完善的本质，它的目的，我讲不清楚。我努力在智力方面完善自己，我什么都学，只要我力所能及，只要生活促使我这样做。我努力完善自己的意志——制定我努力遵守的准则，体力上完善自己，做各式各样的体操，锻炼体力和灵活性，通过艰难困苦来培养自己的韧性和耐力。我认为这一切都属于完善。最根本的当然是道德的完善，但不久它就被一般的完善所代替，即不是希望在自己或上帝面前，而是希望在别人面前表现得更好些，而且很快这种愿望又被想比别人强些的愿望所代替，即要比别人更有名，更重要，更富有。

二

有机会我要讲一讲我的生活史，我青年时代十年的生活史既感人，又有教益。我看，许许多多人都有同样的体验。我真心诚意想做一个好人，但我年轻，有多种欲望。当我追求美好的东西时，我茕茕一身，十分孤单。每当我企图表现出构成我最真诚的希望的那一切，即成为一个道德高尚的人，我遇到的是轻蔑和嘲笑；而只要我迷恋于卑劣的情欲，别人便来称赞我，鼓励我。虚荣、权欲、自私、淫欲、骄傲、愤怒、报复——所有这一切都受到尊

敬。沉湎于这些欲望，我就像一个成年人了，我便感觉到别人对我是满意的。那位抚养过我的善良的姑妈，一个非常纯洁的人，老是对我说，她最希望我与有夫之妇发生关系：“Rien ne forme un jeune homme comme une liaison avec une femme comme il faut”^①。她希望我还能得到另一种幸福，即成为副官，最好是皇帝的副官。而最大的幸福是我和一位非常富有的姑娘结婚，并因此而获得奴隶，越多越好。

想到这几年，我不能不感到可怕、厌恶和内心的痛苦。在打仗的时候我杀过人，为了置人于死地而挑起决斗。我赌博、挥霍，吞没农民的劳动果实，处罚他们，过着淫荡的生活，吹牛撒谎，欺骗偷盗、形形色色的通奸、酗酒、暴力、杀人……没有一种罪行我没有干过，为此我得到夸奖，我的同辈过去和现在都认为我是一个道德比较高尚的人。

我这样过了十年。

当时我出于虚荣、自私和骄傲开始写作。在写作中我的所作所为与生活中完全相同。为了猎取名利（这是我写作的目的），我必须把美隐藏起来，而去表现丑。我就是这样做的。有多少次我在作品中以淡漠，甚至轻微的讽刺作掩护，千方百计地把自己的、构成我的生活目标的对善良的追求隐蔽起来。而且我达到了目的，大家都称赞我。

我二十六岁于战争结束后回到彼得堡^②，和作家们有了来往。他们把我当作自己人，奉承我。转眼之间，我与之接近的那些作家所特有的生活观被我接受了，而且完全抹掉了我身上原

① 法语：“没有什么能比与一个体面的妇女发生关系更能使年轻人有教养的了。”

② 1855年11月19日，托尔斯泰于克里木战争结束后来到彼得堡。

有的想变得好一些的任何打算。这些观点为我的放荡生活提供理论并为之辩护。

这些人——我在创作上的同行的人生观是：生命总是向前发展的，我们这些有见地的人是这种发展的主要参加者，而在有见地的人中间，最有影响的要算我们——艺术家、诗人。我们的职责是教育人。为了不给自己提出一个合乎自然的问题：“我知道什么，能教人什么？”就说这在理论上已经解决，不必追究，艺术家和诗人是在不知不觉间教育人。我被认为是一个非常出色的艺术家和诗人，因此我接受这种理论是很自然的。我是艺术家，诗人，我写作，教育别人，连自己也不知道教的是什么。为此人家付给我钱，我食有佳肴，住有高楼，美女作伴，高朋满座，名满天下。由此可见，我所教的一切都是非常好的。

相信诗的意义和生命的发展是一种信仰，我曾为之献身。为它献身是非常有利和愉快的。我依靠这一信仰生活了很久，并不怀疑它的正确性。可是这样生活到第二年，特别是第三年，我就开始怀疑这一信仰的正确性，并开始研究它了。使我怀疑的第一个原因是，我发现献身于这一信仰的人并不都一致。一些人说：我们是最好的和有益的导师，我们教的东西都有用，而别人教得不对。另一些人则说：我们才是真正的导师，你们教得不对。他们又吵又闹，互相指责，勾心斗角。除此以外，他们当中许多人根本不关心谁是谁非，只想利用写作达到自己的自私的目的。这一切都使我怀疑我们的信仰的正确性。

另外，由于怀疑作家的信仰的正确性，我更加注意观察献身于创作的人，并且确信，几乎所有献身于这一信仰的人，即作家，都是不道德的人，而且大部分是坏人，性格猥琐，比我以前放荡不羁和当军人的时候见到的要低下得多。但是他们很自信，自我

欣赏，只有十全十美的圣徒或者对圣洁的东西一无所知的人才能这样自我陶醉。我讨厌这类人，也讨厌自己，终于我理解到，这种信仰是骗人的。

奇怪的是，虽然我很快就明白了这一信仰有多虚伪，并且抛弃了它，但是这些人给予我的称号——艺术家、诗人、导师的称号我没有抛弃。我天真地想象我是诗人、艺术家，我能够教导一切人，虽然自己也不知道教什么。我就是这样做的。

由于与这些人接近，我沾染了一个新的弱点——近乎病态的骄傲和疯狂的自信，相信我的职责是教导人们，虽然自己也不知道教什么。

现在回想起这段时间，当时自己的情绪和那些人的情绪（现在这种人还有成千上万），我感到可怜，可怕，可笑，会出现只有在疯人院里才能体验到的那种感觉。

那时我们都相信，我们必须不停地讲话，写作，出版——尽量快，尽量多，认为这一切都是人类幸福所必需的。我们成千上万的人，一面互相否定、责骂，一面不断地出版，写作，教训别人。我们不觉得自己很无知，连最简单的生活问题，即什么是好，什么是坏，我们都不知该怎样回答。我们大家一起讲话，不听对方说什么，有时互相姑息和吹捧，以便别人也姑息和吹捧我，有时则情绪激动，争吵不休，完全和疯人院的情况一样。

成千上万的工人日日夜夜拼命干活，排字，印刷了亿万字的作品，邮局把它们分发到俄国各地，而我们总是说教，没完没了，越来越多，而且无论如何也来不及把什么都教给人家，还要生气，说人家听得少。

这太奇怪了，但现在我完全理解。我们真正的、内心深处的想法是，我们希望获得金钱和称赞，越多越好。为了达到这一目